目　录

一九二八年的南溪农民暴动……张君甫（1）
记解放前成都的几家进步报纸……苏幼农（13）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李嘉伸（20）
危石顽同志回忆二十年代的革命经历……（26）
回忆我在四川的一段活动……苏雁秋（45）
忆王右木老师……何克希（53）
忆赵一曼同志……郑则龙（56）
赵一曼在宜宾……邓可非（65）
郑佑之同志革命事迹片断……陈　宠（79）
关于刘愿庵同志的片断回忆……李宗林（89）
记余宏文烈士……程子健（97）
钟善辅烈士在成都的革命活动……高思伯（104）
记徐永弟烈士二三事……徐庆坚（110）
郑佑之书信选录……（114）
秦青川日记……（142）
秦青川日记中几点事实的说明……黄里州（1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九二八年的南溪农民暴动

张君甫

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川南，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南溪经常驻军，此去彼来。军阀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在辖区横征暴敛，拉伕勒索，为所欲为。当时有这样一首词："乙丑新秋十九，驻军来扎乡头，芦亭坝上万人愁，不知要住多久？白日捉鸡提鸭，夜晚牵猪牵牛，一天到晚不停留，三十六天才走。"这确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军阀之外，还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奸商巨贾的巧取豪夺，土匪的四处抢劫。天灾人祸，交相煎迫，弄得农村十室九空，城市百业萧条，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工农大众与封建军阀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中共在南溪的组织，乃因势利导，于一九二八年春发动广大农民揭竿起义，在我国农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一九二五年到二六年间，南溪有一批在泸州川南师范读书的李立之、包析城、周伯尧、张大经、包灿文、张松鹤等中共党员学生返乡，一九二六年在南溪建立了党支部，李立之任书记，包析城和包灿文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不久张质夫从成都回来接替了组织工作，张守恒也从北京的中国大学毕业回来参加活动。支部

在高等小学、第一国民学校和李庄三处建立了党的小组。后陆续发展叶幼裴、董少华、张厚成、包昭明、阙思懿、熊光牒，李铁根、罗纯芬、李子谷等为党员。一九二七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在重庆中法大学读书的党、团员胡明鑫、胡明琮、罗蔚芬、熊大猷、廖时勉、曾庆铁、周小如等亦回县。据中共川南特委指示，成立了南溪县委，李立之任书记，廖时勉任团委书记。县委决定继续发展组织，开展宣传工作。到一九二八年南溪农暴发生时，全县有党员一百余名。

一九二七年上学期，张守恒、张质夫等党团员在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儿童团，在学生中灌输进步思想，每逢场期就以“活泼儿童团”名义上街宣传。当时的县教育局奉命成立“义务教育期成会”，要建立一个推行义务教育的宣传队，县委即设法利用宣传队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为发展农运创造条件。宣传队成员全为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逢到哪个乡赶集就到哪个乡去作宣传，在十来天的时间内，走遍了全县十八个乡场，使农民群众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有了一些了解，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有所认识。

一九二七年下学期，廖时勉等在县中学生中组织学术研究会，逐步吸收进步学生入团，并在校建立了团的支部，罗纯芬任支部书记，共发展团员十余人。研究会组织学生学习时事和革命理论，编演《孙炳文先生之死》、《五卅惨案》等话剧。

根据省委的指示，县委的主要工作仍是大力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内，党、团员均到各乡镇农村访贫问苦，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并以反对军阀统治、抗税抗捐为号召。由点到面地在十多个乡建立了农协支部和乡农协会。北岸的

外东，南岸的李庄、宋家、牟坪是重点。长宁县境内的达马洞、庆符县境内的汉王山、叙天坝也都建立了农协组织。全县农协会员在农暴前夕共发展到五千以上。

鉴于各乡团丁多半是贫苦农民出身，有可能将团练队伍造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党组织经过一段审慎的工作，将宋家乡的民团大队长张云龙吸收入党，并进而在大队的干部中发展党、团员，使全大队绝大多数团丁都参加了农民协会。牟坪方面把李端乡的一个团练分队长王南阶发展为党员后，一下掌握了一百多名武装。李庄方面则派遣张增元去担任六团的团练中队长。在这些夺得了领导权的团队里，除发展农协组织外，还将好枪和弹药调整到可靠的农协会员手中。此外也找当地绅商出钱买枪枝弹药补充队伍。在冬防期中，张云龙曾请黄埔毕业生胡挚才作教官，以进步书刊作教材，集训团丁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余未掌握领导权的民团队伍，则在其中慎重细致地发动团丁加入农协，逐步使团练上层头目失去实际控制权。此外，党组织还在沿河的场镇如李庄、仙人等地组织了力行工人小组，船帮工人小组，配合农协会的行动。

一九二七年腊月初五，县委曾在城内工字街张家漏棚召集一次党团员会议，讨论组织农民暴动的有关问题。会上由主持会议的张守恒传达了上级关于立即在全川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讨论中，以团员占多数的家住南岸各乡的人主张立即着手准备，而以党员占多数的家住城内的人则主张不举行暴动或暂不举行暴动。会议没有作出决议。

县委鉴于农协组织在全县大多数乡镇已经建立，会员激增，便于一九二八年正月十七日在洞贞观召开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

大会由李立之主持，出席的代表有二百八十多人，选出张守恒、李云帆、熊大猷、涂长春、涂俊武等为县农协执行委员，张守恒任主席。

县委还利用元宵灯会，开展宣传活动，曾用南岸青年促进社的名义，印发具有革命内容的车灯唱词，由于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流传很快很广。

（二）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南溪驻军频繁换防。军人挟政，一意孤行，战费开支无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常征的就有三十余种，仅田税一项在一九二八年即已预征到了一九三六年。除纳正税之外，还征收副税。正税每石大洋二元多，加上附加款，每石达二十四元七角多。这些苛捐杂税，名为富户缴纳，实则转嫁于农民。更有所谓瘾民捐、窝捐、懒捐者，则直接向农民苛索。特别是烟苗调查费一项，由县分摊到乡，各乡团总又扩大征收，于是市井细民，小商小贩，概不能免。城乡民众，受此残酷剥削，莫不切齿痛恨。一九二七年夏初，县烟酒事务监察所派牟天保在火神庙召集酒商开会，要提高税率，酒商不允，在争持之下，酒商砸了会议室，轰走了牟天保。经联名上控，得许暂照原税率计征。接着又有城内的商人起来反对征收百货厘金捐，砸了广福门税卡，撕毁了税卡的布招。南溪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在各地发动了抗捐斗争。

一九二八年正月间，宋家乡团总雷敬廷把三万元大洋的烟苗、印花两税摊到全乡各户，并加紧催收，手段毒辣。党指示张守恒、李云帆等领导宋家乡农协会员进行游行示威，抗捐抗税。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敬廷派王建章等人提枪镇压，农民在激愤之下将王打走，雷在办事处只好紧闭大门。观音寺附近两个勒索懒捐的兵痞也被农民暗中杀掉。牟坪乡团总陈跃先将一万数千元的烟苗捐按户摊派，各农协组织就组织抵制。正月十四日，党团员曾诚等人在禹王宫宣传抗捐，即率领大群农民到陈跃先店子说理。陈见农民人多势大，便从后门溜走了。农民掀倒了他的柜台，打烂了他的货物家俱。区团总曾连璧见众怒难犯，只好出面调解，承认全部税款由富绅垫缴，不再普遍征收。其他场镇也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形式之下发动了抗捐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这一斗争提高了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的觉悟，揭开了农民革命暴动的序幕。

（三）

抗捐斗争在各地相继发生后，军政当局急忙筹划对策，或云“清乡”，或云“普剿”，在群众中风言风语流传。党委派人分赴各乡，讲清当时形势，指出斗争前途和办法，稳定民心。一九二八年二月，廖时勉在自贡参加川南特委的会议回来，传达了立即发动春暴的指示。县委具体分析了南溪敌我双方的武装力量：军阀部队只在李庄驻扎了陆连长一个连的兵力，团练局的兵丁不多，武器不足；各乡团队人数虽多，但武器大都不好；并且凡有农协的地方，团丁中的大多数都是农协会员，他们所拥有的武器较好。部分乡团的大、中、分队长是农协骨干，有的还是党、团员。农协掌握的武装，外东（包括留宾）四百人，罗龙百余人，仙人场一百余人，李庄约六百人，绥庆约二百人，李端约一百五十人，毘卢约二百五十人，宋家千余人，牟坪近两千人。这些人中持有快枪（如手枪、单针、毛瑟、五子新式步枪等）的约占三分

之一，持明火枪（如鸟枪、抬炮等）的和持各种刀矛的也各约占三分之一。他如白云乡、黄沙河、石鼓滩、顺南场等也有部分武装，计全县共有武装力量约五千人。县委通过上述的对比，充分估量了农民的革命要求，肯定了暴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便决定立即组织暴动，责成张守恒、洪默深、赵之祥研究制定暴动计划。

张守恒等在李庄制定的计划是：农民武装定名为“川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设牟坪场，曾君杰、赵之祥二人住总指挥部。赵之祥兼任南岸指挥，洪默深任北岸指挥。南溪两岸各乡同时暴动。北岸以外东、留宾联队为主力，首先进城，围缴团练局的枪械，同时分栅搜缴豪绅的枪枝弹药，活捉县知事傅春霖，然后出城收缴城郊各乡武器。如能掌握快枪到两千支以上，则组织南北两岸队伍沿江而上，与宜宾农民会合，攻取宜宾城，否则迅速渡江，另作部署。南岸在牟坪、绥庆、宋家等地取胜后，即到李庄会师，如失利则率部队进入汉王山。发起暴动之前各乡指派专人控制或割断电话线的联系。李庄、仙人场工会小组将李庄至罗龙沿江一带船只控制于南岸的几处指定地点，以备我军渡江。还由学术研究会的共青团员组织一战时宣传队，所需经费由张守恒找张官周资助。

二月初十日，在帅家沟开了一次行动会议，由张守恒主持。决定于十八日晚各乡同时开始暴动。原定之指挥人员作了部分调整，因洪默深未到会，外东增派廖时勉与洪一起负责。宋家由李云帆、张云龙负责。牟坪方面因赵之祥要兼顾全面，便增派涂长春、熊大猷负责。张守恒仍在李庄指挥。会后，与会者分赴各乡向党团员及部分农协骨干传达，各乡又各自作了布置，加紧从

事编队和充实武装的准备。一九二八年农历的闰二月十八日夜，在李庄、牟坪、外东、宋家等地的工农革命军便分别在指定地点集中，一场农民暴动，即将爆发。

在李庄，按原计划本应于十八日同全县其他地区一起行动，由于帅家沟指挥部得知县团练局长洪汉宗家准备在十七日娶媳妇，便提前于十七日起兵攻打蛮洞湾洪家，击毙洪汉宗之父洪辉廷及其子丕德，部队旋即转牟坪集中。十八日夜，李庄附近几处集中的农民军正整装待攻李庄，解决陆连长部队，但李庄指挥部却通知说，由于十七日夜打了蛮洞湾，敌人已加倍警惕，陆连守卫甚严，故我部停止行动。直至二十二日李庄赶集时指挥部才下达命令，令驻炮房头汇合部队主攻镇东场口麻柳坪，宋家驻洞贞观一带部队主攻洗脚塘镇东南场口，吴天观指挥部分兵进击天顶山碉堡，牵制敌人并主攻镇南燕子石场口，李庄六团半坡头指挥部从东岳庙、田坝头主攻镇西场口，并令各部组织部分精干武装先潜入市内把住关口。突击围攻南华宫陆连营地的任务交五团所属农民军执行。当日上午十一时许，由于进击天顶山碉堡和主攻燕子石场口的部队开枪过早，惊动了敌军，敌手枪连冲出场口，在宫山坟坝向我农民军反击，故上坝和后山我军就不能冲入场内。其他几支农民军，或围攻驻军营地，或直捣团练办事处，或据街以守。不久，陆连一个排的兵力从西外牛角沱赶回，后甘营驻宋家的一部也赶到，同本地土豪张访琴一个手枪连一起，从各处向农民军反扑。农民军不顾枪林弹雨，英勇杀敌，毫无畏缩，但由于敌人火力强大，我军新建，缺乏战斗经验，在激战四小时后分路向山岩地区撤退。

在外东乡，按原计划是要首先攻打县城，活捉知事傅春霖。

但却探得傅已于十七日到了长兴乡，十八日将赴仙临乡，而我军主要指挥洪默深又未到（他实际被其叔洪汉宗软禁了），另一指挥夏禹九也往白云组织队伍去了，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廖时勉指挥。廖担心攻城失利而影响全局，故改攻仙临乡，准备在仙临捉拿县知事。如此决定后，外东、留宾两地农民军便在望虹庵集合，共有二百多人，各式枪枝八十多，此外有些鸟枪、刀、矛之类。初更后队伍从望虹庵出发，分三路向仙临乡进军，包围了团练办事处，搜查中，知道傅春霖其时尚未到来，只活捉了团总顾贡三。因他拒不交出枪弹，当即被农民军镇压，师爷顾保之亦被杀，农民军收缴了他们所有的枪弹和现金。当天明后队伍开往刘家场时，场上官兵早已逃窜一空，只搜得旧步枪十支，土抬炮四杆。随后，队伍即分三路由太公岩、磨子岩、幌头寺三处到金竹岩驻扎。次日在岩上整休，观察渡河路线，作夜渡部署。傍晚下羊耳岩，从杨柳篙渡河到宋家地面炮房头一带驻下待命。二十二日，协同各路军攻打李庄，执行主攻东场口麻柳坪任务，并在市内及沿河一带英勇作战。奉令撤退后，一部又进攻宋家乡，但在作战中被打散。

在牟坪，二月十五日后，省委派到南溪指挥农暴的负责人曾君杰和赵之祥以及从宜宾调来的郑则龙、长宁调来的袁敦厚等先后到达，当晚在梁家湾召开牟坪地区的行动会议，决定按县委部署，于十八日晚开始行动，由郑则龙负责宣传，袁敦厚负责管理武器弹药，杨伯泉等三人负责给养，李端乡、王南阶的农民军驻守要隘，牟丙成率队据毘卢作进取汉王山的准备。本地农民军分为两路，总指挥曾君杰参加第一路，由胡家坳走螺海田上街；副总指挥赵之祥参加第二路，由石板田走水田湾经秦家坝上街；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划在沿途收缴土豪劣绅的武器弹药和现金，顽抗者予以镇压，民愤极大而又抗击农民军的则烧其房屋。十八日夜，两支队伍分道行动。在石板田，有一杨姓家，因拒不交出所有的三支手枪，便烧了他的房子，没收了所藏的三支手枪和银元、铜元。在水井湾两家刘姓的家中，收缴了五百个银元，烧毁了刘树武（征粮员）的征粮底册。在秦家坝，枪杀了甲长邹宪章。在石朝门，捉拿了团练大队长张国安；因家人开枪抵抗，张国安逃脱，家人被打死三个。在街上，收缴了豪商周柱三的生洋三百多元。当夜仍返梁家湾一带宿营。十九日，全队进驻牟坪场上，竖起川南工农革命军大旗，沿街张贴标语，并将队伍重新分编，在牟坪附近十里布置防线。第一防线设场北观音寺一带，第二防线设灵官坡一带。二十日上午，在禹王宫大坝举行了庆祝农暴的群众大会，到会军民二千余人，曾君杰主席。曾君杰、郑则龙讲话，号召农民团结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争取成立苏维埃政府，严防敌人的阴谋破坏。涂长春代表农民讲话，说明穷人翻身离不开共产党领导的道理。群众对俘获的团甲豪绅进行了斗争。大会进行中，侦察人员报告，二十四军徐光普旅派了甘、邵两个营偷渡合壁窝，向农暴地区开来。当即宣告散会，迅速调兵增防一、二线。赵之祥亲临第一线指挥，涂长春、胡明鑫、曾诚带了一中队赴第一线，曾君杰亲临第二线指挥，胡明汉、王星乔、熊大猷等带了二中队赴第二线。郑则龙、袁敦厚等留守场上，带领其余队伍准备后备力量。午后二时许，第一线接火，敌以轻重机枪扫射，猛扑而来。农民军英勇鏖战，终以队伍未经训练，武器劣而少，死伤过重而败退。当第一线败回第二线时，二线已遭敌军分兵突袭，腹背受敌，全被冲散，战斗遂告结束。

在宋家场，农协未准时发动暴动，而民团大队长李俊辉则已知蛮洞湾暴动消息，欲以全乡武力镇压农暴并捕杀张云龙，遂于十九日令调李安廷等各个中队到老场口集合。李安廷接受了党的指示，在集合时，乘机开枪将李俊辉击毙，插出红旗，宣布暴动开始。在场团丁几全是各团农协会员，纷起响应。同时，菜园头一带的农民军约一百余人也捣毁了当地高俊青、高俊文、高质三等土豪劣绅的窝子。农民军会合后，由李安廷带到洞贞观一带集中待命，受张云龙指挥。菜园头一队被指派到柏木溪至石笋一带布防，防止敌人偷渡。宋家场农民军由张云龙率领于二十二日攻打李庄。在二十日正午时，甘鼎云营到宋家乡，留下了一个连驻于关帝庙内的团练办事处，本地未去李庄的农民军闻讯后，便立即通知各部包围宋家场。至二十二日晨，从高峰寺、麻柳塝来的约四百人，从蝦蟆岩、鹰咀岩来的约五百人，从苏家观、骑龙坳来的约五百人，从牟坪退却后由陈子卿率领的绥庆乡的约三百人，总共约二千人左右，包围了宋家场。战斗开始后，农民军人数虽多，但武器又少又差，快枪极少，大抬火威胁力虽大，但又慢又不准。敌军据庙顽抗，亦不敢出击。农民军久攻不克，恐误战机，乃火烧雷敬廷的住房，大火一直延烧到关帝庙，敌军只好退守庙后的张爷庙。双方坚持于次日拂晓时，牟坪敌方邵营一部及李庄之敌陆续赶到，庙内敌军始得乘机突围。农民军虽全力攻击，终以弹药缺乏，战斗力削弱而退却。

（四）

起义失败后，张云龙、李廷安等聚集了十多人，重新组成了一个战斗组，潜赴云南边界的古蛮铺，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

下，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处境非常艰难。不久，川南特委派特派员廖维民来南溪清理组织，同张云龙取得了联系，遂率战斗组转汉王山建立根据地，随即将农暴失败后流散在各处的农民聚集起来，在附近一带展开活动。后廖维民被长宁民团捕获，牺牲于下场。

在宋家乡的共产党员林云清，趁民团新任的大队长陈和均进城开会之机，在石笋过河的船上将陈砍死，抛尸河中。宋家乡民团中队长王德三于农暴后借口清查人枪，对农协会员及外出者家属进行敲诈勒索，引起群众公愤，农协会员梁友顺、张寿喜等把王德三灌醉，待过河时将他击毙，投入河中。张守恒、张质夫、洪默深等在农暴失败后转赴外地，后在革命工作中遇难牺牲。

军阀驻南溪部队及旧政府团阀，在农暴之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指张守恒、张云龙、张质夫、李立之、张君甫、熊大猷、李云帆、廖时勉等八人为暴动首要，以大洋三百元悬赏缉捕，并没收家产。凡被指定为参加过农暴的人，就清查其产业，以“逆产”予以充公拍卖。连张守恒的内兄曾云辉，本未参加农暴，亦以“包庇张守恒，隐匿不报”之罪，被罚款五百大洋，以致全家流离失所。敌军还到发生过农暴的各个乡去“普查清剿”，肆意掠夺，杀害居民。在李庄的战斗结束后三天，陆连长便将俘获的农协人员洪大毛等十一人集体杀害于镇东场口。县公署还召开过一次乡团会议，订了一个所谓团务整顿案，决定加紧购置五子枪，每甲至少添罐儿炮四支，加紧冬防训练，于要隘处设哨棚；实行连坐法，凡搁置不办者予以严究。

农暴期中，牺牲于战场上、刑场上、监狱中、江河中者不计其数，仅现在已知名而查证清楚了的就有曾君杰、胡明鑫、曾

诚、胡明汉、张云龙、洪默深等六十七人。无名英雄，则不知凡几。李庄一役，牺牲于大河之中者，亦当近百。

一九八二年九月

记解放前成都的几家进步报纸

苏　幼　农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这段时间，我曾参加成都《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和《捷报》等几家报纸的编辑工作。它们都是四川最早宣传抗日的进步报纸，在当时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曾起到很大作用，深受群众欢迎。

《国难三日刊》始末

一九三七年上期，我在南虹高级艺术职业学校任训育主任兼教国文课。这个学校是周卜熊和川大几位教授刚刚创办的。因没有经费来源，大家就凑了一点钱，在华西坝后侧乡村租了一栋房子，买了一些教具。这时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活跃，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歌咏队、演剧队等，到处都在活动，真是生气勃勃。记得这年的“五·一”劳动节，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群众纪念大会。为了防止军警的干涉阻挠，开会时就把四川辛亥革命的元老尹昌衡搬了出来，由他先讲话。尹讲什么“止园哲学”，群众听不懂，但大会总算顺利开成了。接着是张澜讲，他才讲到“五·一”劳动节和抗日救亡的题目上，听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开始只有四、五百人，最后就有两千多

人，群众还高呼起抗日救国的口号来。这次大会打开了群众公开活动的场面。

就在这年的暑假，罗世文同志来找我，说不久要办一张报纸，要我去担任编辑，并告诉我钟汝为也还要来。钟汝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时他是国民党左派，我在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我们就互相认识，他还了解我一九二九年在北京创办邻水同乡会会刊《新邻报》的情况。很快，钟汝为就来了，他向我介绍了《国难三日刊》的背景、宗旨和编辑人员的情况，我就应约去担任编辑工作。当时《国难三日刊》的人员情况是：社长钟汝为，主要负责对外和写社论；总编辑王达非，主要编写电讯，也写社论；编辑郭祖勘，负责编写国际新闻；游元亮负责编写国内新闻；苏爱吾（即苏幼农）负责副刊编辑；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外勤的人。

《国难三日刊》是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不很重视社会新闻。如成都的学生救亡运动，就是报纸宣传报导的重要方面。在副刊中有一栏叫“白刃集”，刊载杂文式的短文，多则百余字，少则几十字。尖锐的讽刺，就象锋利的短剑，是专门针对反动派及一切妥协投降者的。

《国难三日刊》倾向共产党、八路军，坚决主张抗战、主张进步。它立场鲜明，言论正确，深受群众欢迎，不到三个月就发行到三万余份，遍及川军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各省。但正因为这样，也深受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及省党部的忌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刘湘出川抗战以后，它就被查封了。

一九三八年春，邓锡侯当上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还想当四川省的主席。他了解《国难三日刊》原来在读者中很有影响，就

想利用来为自己当省主席造舆论，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就酝酿复刊。我们提出了复刊的条件，要求让原班人马全部复职，经过往返交涉，迟迟未能成功。后来为了早日复刊，才决定让步，让原社长钟汝为退出，王达非让出总编辑职务。复刊后的人员安排是：社长刘东父（实际是挂名），总编辑赵普炬，负责审稿和写社论；编辑王达非，编写电讯，后来也写社论；郭祖勘，编国际版；游元亮，编国内版；苏爱吾，编副刊；外勤孙蕴实，发行汪绍业。

由于原来部分订户的名册在我们手里，复刊之前就发出了通知；原订户未满期的继续发报，已满期的重新征订，所以很快就恢复了原发行数量，订户还略有增加。

创办《时事新刊》

《国难三日刊》复刊不久，就同《成都快报》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成都快报》是最反动的报纸，它的副刊编辑何鸿军（笔名何满子），是康泽的爪牙。这人天天写文章骂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就同他针锋相对，他写一篇，我写几篇；他揪住共产党、八路军不放，我就抓住他不放。不久我们那个总编辑赵普炬就出面干涉，先是在编委会上说我不顾大局，过于认真、尖锐，惹是生非；继后就扣稿不发。到了山西大学的张慕陶托派汉奸案发生，斗争就更激烈了。我写的稿子直接送排字房，他知道后就到排字房抽扣，我和他的矛盾就公开化了。我质问他为什么扣我的稿子？他说是为了关系，为了团结。我说："《成都快报》天天反共，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是讲团结吗？"他说："那是他们的事，我管不着。"我气极了，就骂他是妥协投降派、口是心非

的伪君子。这时，郭祖劼也跑到《飞报》当编辑去了，于是我和王达非、游元亮、孙蕴实多次开会商量对付的办法，决定立即筹备创办《时事新刊》，以接替《国难三日刊》。但是《国难三日刊》在读者中是很有影响的报纸，这个阵地不能放弃，更不能让敌人利用。我们就一方面想法把《国难三日刊》的订户逐渐转移到《时事新刊》，一方面消极怠工，想法把它拖垮。

创办《时事新刊》，立案是个困难，我就去找张雪岩。张是邓锡侯的秘书，政治色彩较少，我请他当《时事新刊》的社长，并以他的名义去省党部立案。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同年夏天，《时事新刊》就出版了。《时事新刊》的班子主要是原《国难三日刊》的人员：社长张雪岩；总编辑王达非，后来是刘办慈；编辑苏爱吾，负责国际版和副刊；游元亮，负责国内版，他后来去天全县当县长，由彭为和继编；张漾令，负责编辑漫画；外勤孙蕴实、周野南，发行汪绍业。

《时事新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报酬，开始是拿《国难三日刊》的钱维持生活。《国难三日刊》被拖垮自动停刊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各自就利用社会关系找门路。到了一九三九年接受邓锡侯每月九百元的津贴后，报社才开始供应一顿午餐。虽然没有报酬，没有生活来源，报纸却办得有特色，比如，版面虽小，内容丰富，八开的版面却能容纳万余字；文字短小精悍，编排非常紧凑；不登广告，不留空白；自编电讯，内容简明扼要。每周的国际国内版都有时事述评，内容主要是国际、国内的政治和抗战形势，很受读者欢迎。每日副刊有一条短文，约一、二百字，有的只几十个字，是《国难三日刊》中“白刃集”的继续，也是专门针对一切反动逆流的。报纸的标题字，最大的不超过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